

中国华东修辞学会编

修辞学 研究

第七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前 言

《修辞学研究》是中国华东修辞学会主编的学术丛刊。第一辑出版于1983年。

这第七辑是1992年10月在扬州召开的中国华东修辞学会第七届学术年会暨江苏省修辞学会1992年学术年会的论文选编。参加这次学术年会的除大陆学者外,还有台湾空中大学沈谦博士、许应华先生、高淑英小姐,津巴布韦 Kate Allen 博士,美国 John E. Ingulsrd 博士。Allen 博士的论文是 *What makes a skilled writer* (怎样才能成为熟练的写作者), Ingulsrd 博士的论文是 *New Perspectives on contrastive rhetoric* (对比修辞学的新观点)。

这一辑工作由王希杰先生负责。

这一辑的出版得到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此感谢。

中国华东修辞学会

1992年12月

目 录

〔回顾与展望〕

60 年来的汉语修辞学	复旦大学 宗廷虎 1
修辞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台湾空中大学 沈 谦 7
80 年代江苏修辞学研究	苏州大学 常 棣 28
钱钟书先生的修辞理论与实践	湖南师大 秦旭卿 谭兰冬 36
《修辞学发凡》与 90 年代修辞学	复旦大学 李嘉耀 49
修辞学研究漫谈	南京大学 钱厚生 58
90 年代修辞学的科学化与现代化	暨南大学 李翠芸 66

〔开拓与探索〕

话题连贯与述题连贯	苏州大学 李晋荃 76
语言缺漏面面观	丽水师专 周一农 92
语用共性与风格类型	烟台大学 丁金国 104
试论言语反馈控制的品格与层级	高邮师范 宣景文 109
从新的角度研究广告语言	华东师大 邵敬敏 118
论统计方法在语言表现风格研究中的运用	洛社师范 郑荣馨 131

〔辞格研究〕

论归纳的辞格和演绎的辞格	南京大学 王希杰 140
论夸张的构成、性质与内在机制	徐州师院 江 南 156
关于比喻外部组合形式变化的探讨	福建师大 李延瑞 166

询喻例说	江苏	薛忠正	175
比喻的历史探索	扬州师院	于广元	178
比喻研究述评	阜阳师院	倪祥和	190
浅谈“反典”的修辞手段	安徽师大	汪树福	198

〔文艺修辞〕

文学语言的含蓄美	菏泽师专	岳东生	201
诗歌翻译中的诗歌语言问题	华东师大	潘文国	209
试论人物对话信息差	福建师大	祝敏青	228
谈《红楼梦》的重叠艺术	浙江师大	张先亮	241
《伤逝》语言艺术探秘	宁波师院	金慧萍	253
从《围城》看新潮小说语言超常现象	江苏电大	王 英	266
语言的超常搭配与修辞	江苏	刘良文	王肇升 277
戏剧、电影独白与修辞	宜兴影剧公司	戴立新	286

〔修辞与文化〕

修辞与社会文化背景	浙江师大	陆稼祥	290
花木诗歌的修辞	上海师大	高爱琴	300
花的象征及其文化意蕴	山东师大	谭德姿	312
比喻中的文化因素初探	徐州师大	吴继光	王洪梅 324
藏语中常见的动物比喻	西藏出版社	西绕拉姆	332

〔修辞教学〕

我对修辞教学的基本看法	台湾空中大学	许应华	334
语义指向与语文教学	苏州三中	李悌华	343

〔回顾与展望〕

60 年来的汉语修辞学^{*}

宗廷虎

汉语现代修辞学自从 1932 年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问世后，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与发展了二千多年的古代修辞学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完全不同的特点。60 年的演进虽然经历了两次繁荣，两次停滞，但从总体上看，其轨迹是积极向上，呈螺旋形发展趋势的。尤其是 80 年代，它的生气勃勃、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已引起国际修辞学界的瞩目。回顾 60 年的发展史，总结其历史经验，不仅对中国修辞学迅速向现代化、科学化的目标前进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外修辞学的交流也有积极的作用。本文拟对此作出论断，以求教于参加这次会议的专家学者。

本文的基本观点，系从近几年出版的教本拙著中提炼出来，并有所发展。为节省篇幅，不一一注明出处。

^{*} 本文曾提交新加坡国立大学召开的“汉语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1991 年，新加坡。原名《汉语现代修辞学六十年》。

一 60 年流变鸟瞰

(一)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二)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汉语现代修辞学从第一次繁荣到停滞

第一，繁荣期：1930—1937 年

1. 多角度地开拓了修辞学的领域。
2. 继承“发凡”重视建立体系的传统。
3. 注意继承与借鉴古今中外的修辞遗产。

第二，停滞期：1938—1949 年

(三)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汉语现代修辞学从普及走向提高。

第一，普及。

第二，提高。

(四) 80 年代迄今：汉语现代修辞学的全面繁荣

第一，论著数量空前。

第二，研究的领域大幅度拓展。

第三，在深度上有新的开拓。如：

1. 修辞学理论和修辞学体系的多方面发展和深入。
2. 辞格论的新探讨。
3. 词、句、段、篇修辞研究的深入。
4. 语体风格研究的新进展。
5. 汉语修辞学史研究的新成就。

总起来看，80 年代修辞学的繁荣与发展，在以下方面具有与前 50 年不同的特点。一是呈现了理论觉醒。越来越多的中青年研究者认识到：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汉语修辞学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必须发展理论思维，必须从理论上对一些根本问题作出解答。从经验思维出发，主观随意式地就事论事地把握研究对象的做法

正在被扬弃；客观地对修辞现象进行全面把握、系统分析，追求构建和完善学科体系的做法，正越来越受到重视。二是随着对修辞学对象、性质等根本问题认识的深化，“辞格中心论”的陈旧观点已被摒弃。修辞学的研究范围已扩展到口语、书面语的多个领域。同时除了注意从语言学及其分支汲取营养外，更自觉地注重从邻近学科汲取营养。三是不少学者日益重视研究的创新与多样，开始改变以往研究方法单一的局面而进行着新的探索。除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等方法继续被采用外，辩证法和来自自然科学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以及邻近学科许多常用的方法，均程度不同地被吸收。比较法则用得更多。总之，理论和方法的觉醒，是80年代汉语修辞学最值得重视的特点。

二 历史的沉思

60年来，汉语修辞学经受了众多考验，正在日益成熟。它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启示，促进人们深沉地思索：汉语修辞学发展的关键何在？90年代这门学科怎样才能朝着现代化科学化的目标继续大踏步前进？

（一）时代召唤着理论的开拓与创建

当年《发凡》等专著重视理论建设的历史经验，80年代“理论的觉醒”，都雄辩地证明：是否重视理论建设，乃是修辞学能否顺利前进的关键问题。今天，90年代飞速发展的科技形势、改革开放的宏伟潮流，都对人们的言语交际、修辞学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论是修辞学通论还是分支修辞学，都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都需要建设一系列的基本理论。时代急迫地召唤着修辞学理论的开拓与创建。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不会有正确的实践。

不突破就事论事的、单向的、平面的、线性的思维定势，不对修辞和修辞活动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认识即不可能趋于全面。语言的信息交流是一个“编码——发送——传

递——接收——解码”的过程，应该放眼探索它的全过程，而不能象以往那样只研究信息的表达。修辞现象固然由语言因素组成，但同时它又包含审美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等众多成分，不能仅仅研究前者而忽视后者。修辞研究应该是静态与动态的结合，既要把研究对象放在平衡、稳定、静止的状态中考察，又要看到它是一个活动的过程、双向或多向交流的过程。科学化的时代要求人们思维方式的科学化。只有拓展思路，建立多向的、立体的、辩证的思维方式，才能准确地把握复杂的修辞实际，才能符合时代的要求。

修辞学既隶属于语言学，又是一门多边性、边缘性的学科。这一性质决定了它的理论的开拓与创建，必须既从语言学科和文学、美学、心理学、文化学甚至自然科学中汲取养料，更要吸收当代科学的新成果。吸收当然不是全盘照搬、生吞活剥，而是要消化、改造成自身的理论。

理论的建设固然艰巨，但它将带来十分美好的前景。

（二）改革呼唤着实践的广泛和深入

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着神州大地。改革开放越深化，言语交际的领域也越广泛。修辞研究的触角只有伸向言语交际的一切领域，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以往的研究实践，较多地从书面语中的文艺语体搜集语料，由此概括出来的许多规律，难以在其它语体中适用。应该把语料的搜集和分析扩大到口语、科技、公文、政论等语体，以及新闻、外交、司法、商业等多种领域。

改革开放越深入，修辞研究应该越深入地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探索。既要在目前研究成果已经较多的，如词句篇章修辞、修辞格、语体风格、古汉语修辞、修辞学史等领域里深入；也要拓展视野，把视角射向一些新兴的边缘交叉领域。诸如系统论修辞学、信息论修辞学、控制论修辞学、心理修辞学、美学修辞学、社会修辞学、公共关系修辞学等学科的建立，同样离不开大量的修辞研究实践的基础。但从总体上看，修辞学的发展更迫切需要加

强对本体的研究探讨。实践之花盛开，是摘取研究硕果的前提。

陈望道先生说：“科学研究除了最广泛地搜集事实之外，还必须有最高的综合”，“单将搜集的各个个别的事实罗列起来，拿罗列得多算是富有，算是成功，那只能算是杂纂的态度，并不是真正研究的方法”。他又指出：“必须能从事实中探求出规律来”，“所谓规律就是关系……就是普遍的必然的关系”。可见，应该在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规律，剖析其内部的各种“关系”，构建科学的体系，才算上升到了理论。理论与实践是辩证的统一体。

（三）学科寻找着方法的多样化、科学化

方法乃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许多学者，譬如前述陈望道先生就很重视方法，因为方法的变换往往导致学科的革新。一门学科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研究方法的演进史。方法是否科学，直接关系到学科能否顺利前进。

方法是客体的对应物。选择什么方法应以是否适应研究对象为基准。修辞学以修辞现象为研究对象，修辞现象又总是为了一定的言语交际目的而产生，并存在于具体的环境中的。望道先生“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的论说，既是修辞观，又是方法论。以往的研究较多地着眼于一般学科通用的方法，注意了共性而忽视了特性。必须寻找适合本学科特殊性的方法。对题旨情境适应性的分析，应该成为修辞学研究特有的方法。

修辞学的性质和修辞现象的易变性决定了修辞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修辞学作为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语言学研究的种种方法，如历史比较、结构主义、转换生成以及话语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语义学等采取的方法，修辞学均可运用。修辞学又是一门多边性学科，邻近诸多学科采用的文艺批评、心理分析、审美分析、大众传播以及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等逻辑方法，修辞学也可采用。另外还可运用自然学科中所用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模糊数学、统计等方法。也还要寻找其它适合修辞学运

用的方法。可根据“互补性原理”，在运用中让多种方法相互协同，相互补充，从而使探讨更加全面。

修辞学的现代化、科学化，必然要求方法的多样化、科学化。不仅要提倡方法的不断更新，而且要重视方法的理论研究。只有加强修辞学方法论的探讨，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

除了上述引起人们深思的问题外，诸如汲取古今中外的优秀学术成果；凝聚起更多的研究者，提高研究队伍的素质；加强国内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等，也都是重要的经验。

回顾过去是为了把握现在，发展将来。汉语古代修辞学曾经以它独特的发展轨迹，显示了动人的魅力，从而自立于世界古代修辞学之林，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汉语现代修辞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也已经取得了众多的成就，但与修辞学现代化、科学化的要求相比，与文明古国的传统相比，还很不够。90年代的汉语修辞学应该加速前进的步伐，以高质量的研究硕果迎接21世纪，为促进世界修辞学的蓬勃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附记：

因篇幅所限及资料掌握有限，本文未包括台湾汉语修辞学发展概况。或详见拙作《试论台湾修辞学的发展》，见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4期。

修辞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沈 谦*

中华民族是一个修辞学很发达的民族，但并不是一个修辞学研究很发达的民族，中国的言辞与文辞，丰盈并妙，多采多姿，极尽画妍，再加上文化传统与文学传统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花果蔚蕃。因此，中国语文的修辞非常发达，成果辉煌。但是有关修辞学的研究，则未足以称之。自先秦至晚清，言及修辞的书，虽然为数不少，但多为零散的吉光片羽，即如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宋陈騌《文则》、元王构《修辞鉴衡》、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等，也都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修辞”之能称“学”，成为一门有系统的学问，对于修辞理论及方法作全面研究阐述的专著之问世，则是20世纪以后的事。本文拟分作：（一）修辞学研究之鸟瞰。（二）修辞学研究之成果。（三）修辞学研究之展望。针对修辞学之研究，作一番概括性的检讨与前瞻。

一 修辞学研究之鸟瞰

20世纪中国修辞学的研究发展，可以195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阶段。

民国初年，中国修辞学的研究，曾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一股热潮，著作如林。大体上可分为新旧两派：

* 沈谦，台湾空中大学人文系副教授，出版中心主任。

旧派如郑奠的《中国修辞学研究法》(自印,未注出版年月)、杨树达的《汉文文言修辞学》(初名《中国修辞学》,后改此名,更为切题,1933年,世界书局)、张文治的《古书修辞例》(1937年9月,中华书局)等,多属修辞古说、古例的集录,略加演绎阐述,旨在提供参考资料。其主张可以列举二家以窥其崖略:

近世外慕风炽,举海外修辞之术,绳诸前文,得其形似,乐为比附,彼所未及,此亦阙如。今思述先士之正论,考前文之成规,范为修辞之学,先陈研究之法。(郑奠:《中国修辞学研究法·导言》)

族姓不同,则其所以求美之术自异。况在华夏,历古以尚文为治,而谓其修辞之术与欧洲为一源,不亦诬乎?昧者顾取彼族之所为——袭之。彼之所有,则我必具;彼之所缺,则我不能独有;其贬己媚人,不已甚乎!吾今不欲谓吾书足以尽吾国修辞之全,第欲令世之治此学者,知此事为一族文化之彰表,义当沉浸于旧闻而以钩稽之法出之,无为削己足而适人履。(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自序》)

由此可见,旧派的基本立场,与新派的修辞学家针锋相对。

新派的修辞学研究,主张参酌西欧研究修辞的科学方法,来探讨中国的修辞现象,最早的代表是唐钺的《修辞格》(1923年,商务印书馆)。作者在例言中明言英文参考书对本书助力很多的是下列两书:J. C. Nesfield, Senior Course of English Composition, 1910. J. C. Fernald, Expressive English, 1918. 并且在《绪论》中说:

要讨论修辞格,为便利起见,不得不把他们分类。但是分类的方法很多,本书姑且采用一种,省得讨论时完全没有头绪。兹略依讷斯菲《高级英文作文学》里头的分类,而斟

酌损益成下列的统系。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结语》在论及中外修辞学说竞争时期时特别推崇说：

当时对于修辞学最有贡献的，大家熟知，是1923年出版的唐钺的《修辞格》。此书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这书所讨论的也不过是本书所谓辞格的一小部分，但因找例很勤，说述也颇得当，又是科学的修辞论的先声，对于当时的影响很大。从这本小书出版以后，修辞学便又换了一个新局面。修辞学的成立已经没有人怀疑，修辞学和文法的竞争也告终结，同时却在修辞学界里面展开了一个中外修辞学说竞争的场面。

继此而起的，有董鲁安的《修辞学讲义》（1926年3月，北平文化学社）、张弓的《中国修辞学》（1926年6月，天津南开华英书局）、王易的《修辞学》（1926年6月，商务印书馆）、薛祥绥的《修辞学》（1931年5月，世界书局）、陈介白的《修辞学讲话》（1931年8月，上海开明书店）等，这许多修辞学的书，或挂漏不全，或全举古文例证，或贩运西洋辞格，并未“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针对中国的修辞现象，作彻底精细的归纳，仍然扮演的是开路先锋的角色。

直到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出世，才彻底将中国修辞学加以革新，归纳各种修辞现象，参酌中西，熔铸新说，写成一部兼顾文言白话的修辞专著。陈著于1932年1月由上海大江书铺印行上册，同年8月印行下册。刘大白在替该书作序时说得好：

1932年，将要合1898年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纪念的一年了。因为1898年是中国第一本文法书《马氏文通》出

版的一年，而1932年是中国第一部修辞学书出版的一年。

刘氏的话似乎出自修辞格的“夸饰”，但可见陈著备受推崇之一斑，且只要将其中的“中国文学史上”改成“中国文法修辞学史上”，也就相去不远。事实上，陈著出版后，风行数十年，影响广远，虽历时半个世纪，迄今风流未沫。

第一阶段修辞学的发展，除了以新旧两派区分之外，上海复旦大学宗廷虎教授《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从历史分期的角度分为三期^①，兹撮述如下：

（一）萌芽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为现代修辞学的萌芽时期。特点是涌现了一些受日本和西洋修辞学影响的著作。最早问世的修辞学著作如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1905年，上海开明书店）、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编》（1905年，上海广智书局）、王梦曾的《中华中学文法要略·修辞编》（1913年，上海中华书局）、程善之的《修辞初步》（1918年，上海有正书局）等，全盘照搬外国的痕迹较重，写得较为粗糙。同时，也有一些继承古代修辞理论的著作出版，如吴曾祺《涵芬楼文谈》等。这些书同时又是文章学著作，从修辞角度来总结规律、建立体系不够。这个时期文法和修辞的观念又是混淆不清的。

（二）建立时期

第二个时期从五四运动到1932年《修辞学发凡》问世，为修辞学的逐步建立时期。特点是主张向外国学习的新派的研究成果大量增多，涌现了好几种修辞学体系，主张继承古代的旧派著作虽有问世，但数量和质量上均比不上前者。也出现了揉合新旧派之长的修辞学著作，如董鲁安的《修辞学》等。这一时期的修辞

^① 详见宗廷虎《中国现代修辞学史·引喻·现代修辞学发展的历史分期》，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2月。

学研究有了质的飞跃，新派的著作如唐钺的《修辞格》等，具有较强的科学性。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化的科学的现代修辞学及其体系的正式建立，代表了修辞学研究的高峰。

（三）发展时期

第三个时期，从1933年到1950年，是现代修辞学的发展时期。特点是修辞学走向全面发展，这一阶段新旧派之间的对立已逐渐消除，实用修辞、白话修辞、古汉语修辞、辞格专题研究、语言风格、文体、社会修辞学、修辞理论等都有了发展。1933年到1937年，问世的修辞学专著较多，5年内有20种。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战乱频仍，修辞学著作也就大为减少^①。

1950年，由于政治的分隔，后一阶段修辞学的研究，便成为大陆与台湾分别发展的两条路线。

1950年以后大陆地区的修辞论著，根据黄民裕《辞格汇编》（1984年4月，湖南人民出版社）与黎运汉、张维耿合著《现代汉语修辞学》（1986年8月，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二书所列书目，约有五十种左右（迄至1981年）。至于其中的代表作，则黎、张二氏在其书第三章《汉语修辞学的建立和发展》中云：

1951年，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使汉语修辞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语法修辞讲话》的表达部分，比较侧重语言的运用。它引用大量表达不当的语文病例，进行恰当的分析，从中说明修辞的规律，指导人们纠正语言表达上的毛病。在《语法修辞讲话》的影响下，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出版了不少专著。较有代表性的是1953年出版的张环

① 据宗廷虎《中国现代修辞学史》附录〈中国现代修辞学参考书目〉，萌芽时期（1905—1919）修辞学著作有7种，建立时期（1920—1932）著作有16种，发展时期（1933—1940）著作有22种，其中1933年至1937年间5年内著作有20种，可谓盛况空前。

一的《修辞概要》，1956年出版的倪宝元的《修辞学习》和周振甫的《通俗修辞讲话》，1957年出版的张剑声的《汉语积极修辞》，1958年出版的吕景先的《修词学习》，1960年出版的周迟明的《汉语修辞》，1961年出版的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等。

黎氏等又指明60年代的修辞学研究成果，以张环一、张弓二家成就最大。嗣后由于文革动乱，1966年至1976年十年间，大陆的修辞学研究几乎陷于停顿的静止状态。倒是台湾地区的修辞学研究，蓬勃发展，出版了不少专著，斐然可观。直到1976年以后，大陆地区的修辞学研究才逐渐恢复生机，陆续出版和发表专著、论文，再加上1980年12月成立中国修辞学会，定期召开年会，出版论文集，修辞学界空前活跃。黎氏又列举其著作云：

苏远汉的《现代汉语修辞知识》，倪宝元的《修辞》、《词语的锤炼》，吴士文的《修辞讲话》，郑颐寿的《比较修辞》，张志公主编的《现代汉语》下册（修辞），郑远汉的《辞格辨异》，濮侃的《辞格比较》，谭永祥的《修辞新格》，林兴仁的《句式的选择和运用》，赵克勤的《古汉语修辞简论》，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程希岚的《修辞学新编》，以及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会的《修辞学研究》，复旦大学语言教研室的《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中国修辞学会的《修辞学论文集》第一、二集等，都是新成果的代表作。

黎氏尝指明其中郑远汉、吴士文、郑颐寿等三家之作以及中国修辞学会的论文集，对于修辞学新领域的开拓、修辞学新体系的创建、现代修辞学的发展，都颇具贡献。黎氏未曾言及者另有

郑莫、谭全基编《古汉语修辞资料汇编》^①，搜集传统修辞学资料，颇称详富。

后一阶段修辞学的发展，除了以上的概况之外，宗廷虎教授《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从历史的角度分为三期，兹概括如下：

（一）白话修辞学的创立与发展期

从1950年到1966年，是白话修辞学的创立与发展时期，最大特征是修辞学走向普及。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揭开了白话修辞学新的一页，张环一的《修辞概要》，标志着白话修辞学的正式建立。由于政府的提倡，修辞知识得到广泛的传播，学生在初中阶段就被传授修辞知识。因为受苏联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修辞理论和语体风格论有了发展。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成为当时修辞学深入探索的标志。

（二）修辞学的沉寂期

从1966年到1976年，为修辞学的“沉寂期”。十年动乱破坏了学术文化，使这一时期的修辞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只是在70年代初、中期，由于大学教育的需要，修辞知识才得到一些传播。这一时期台湾的修辞学却有了发展，已从模仿期进入创新期。

（三）修辞学的繁荣期

自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以来，修辞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开始走向繁荣。这一时期民主空气的增强，学术气氛的浓厚，各级修辞学会的成立，都为修辞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这一阶段，修辞理论、修辞手法（包括修辞格和词、句、段、篇修辞）、修辞学体系、古汉语修辞、语体学研究、修辞学史研究等等都有发展，其中有些方面步子还迈得较快，有的发展迅猛。

^① 郑莫、谭全基编《古汉语修辞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80年7月。又台北明文书局，1984年9月。